



中山陵趣闻

孙中山纪念馆编

中山陵趣闻

孙中山纪念馆 编

东南大学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 012 号

编委 范方镇 后惠兰
向阳鸣
摄影 夏太宁

中山陵趣闻

孙中山纪念馆 编

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四牌楼 2 号
南京五四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5 插页 1 字数 130 千字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20501 - 28500 册

ISBN 7 - 81023 - 739 - X

K·13

定价:3.80

目 录

一、孙中山与中山陵

- | | |
|-----------------------|----|
| 孙中山北上病逝前后····· | 1 |
| 孙中山的三份遗嘱····· | 6 |
| 孙中山的亲属和后裔····· | 9 |
| 孙中山自选墓葬地····· | 17 |
| 孙中山的楠木棺、水晶棺和美式铜棺····· | 18 |
| 孙中山先生遗体历险记····· | 20 |
| 孙中山先生安葬始末····· | 22 |
| 孙中山遗体今何在····· | 29 |

二、中山陵的建设

- | | |
|---------------------------|----|
| 中山陵建设指挥部——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 | 32 |
| 设计中山陵的一次大奖赛····· | 34 |
| 中山陵的选址和圈地····· | 36 |
| 中山陵的兴建····· | 39 |

三、民国名人与中山陵

- | | |
|--------------|----|
| 蒋介石与中山陵····· | 43 |
| 孙科与中山陵····· | 50 |

吕彦直设计中山陵	55
林焕廷与中山陵	57
宋美龄与美龄宫	62
墨遗灵谷塔的两位老人	66

四、纪念建筑

中山陵纪念建筑种种	74
孙中山铜像二三事	83
藏经楼——孙中山纪念馆	88
郊球会和它的高尔夫球场	90

五、陵园趣事

汪精卫尸埋梅花山	93
戴笠之死与戴笠墓	96
日领事“失踪”藏陵园	100
陵前剖腹的将军	106
众将官泄愤哭孙陵	109

六、附葬诸墓

廖仲恺、何香凝墓	114
范鸿仙墓	116
景色迷人的谭延闿墓	119
南京航空烈士公墓	122
邓演达烈士墓	125
民国上将韩恢墓	128

七、明孝陵

- 明太祖真的葬于明孝陵吗? 131
- 漫话明孝陵的妃嫔殉葬..... 135
- 马皇后与懿文太子..... 139
- 明成祖朱棣与四方城..... 144
- 明代功臣墓..... 149

八、其它胜迹

- 金陵名刹灵谷寺..... 154
- 灵谷寺与阵亡将士公墓..... 158
- 王安石与钟山..... 163
- 志公和尚与宝公塔、志公殿 168

一、孙中山与中山陵

孙中山北上病逝前后

孙中山晚年，中国处于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状态，名义上在北京有一个中央政府，但北京政府被北洋军阀控制。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以贿选手段当上“总统”，更为全国各界民众所唾弃，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着东北，形同独立，其他各省也处于大大小小的地方军阀操纵之下。只有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革命政府代表了中国的希望，但广东革命政府只控制着很小的一块地盘，虽然如此，全国人民，包括一些爱国的军阀将领，都把希望寄托在孙中山身上。

1924年秋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10月23日，直系爱国将领冯玉祥乘机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随即打电报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多年来致力于中国的统一，结束军阀混战的分裂状态。接到冯玉祥的电报他很高兴，立即复电表示“义旗聿举，大慙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亟欲决定，拟即北上，与诸兄唔商。”

当时北方局势异常混乱，奉军乘机长驱直入，南方的直系将领肖耀南、齐燮元、孙传芳等派兵北上，援助吴佩孚，山西军阀阎锡山出兵占领石家庄，切断京汉铁路，山东军阀郑士琦宣布中立，切断津浦线，保皇党人则纷纷出动，企图扶持清帝复

辟。冯玉祥为先发制人起见，驱逐清帝溥仪出宫。在直皖战争中失败的皖系将领和政客，则乘机拥护皖系头目段祺瑞出山。冯玉祥迫于大势，只得请隐居天津的段祺瑞出面维持，11月24日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面对北方的动荡局面，国民党内有许多人劝孙中山不要冒险北上。孙中山为了促进国内和平统一，拯救水深火热中的广大民众，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北上。他对那些劝他的人说：“汝等以大元帅视我，则我此行诚险；若以革命党领袖视我，则此行实无危险可言。”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乘永丰舰离广州北上，随行的有夫人宋庆龄以及邵元冲、李烈钧、黄昌谷等。

船过黄埔时，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率师生列队在码头迎接，孙中山在蒋介石陪同下视察了黄埔军校，并观看了黄埔军校学生的战术演习。他深有感触地对蒋介石说：“我这次北上，明知非常危险，将来能不能回来还不一定。但我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有什么危险可言呢？何况我已五十九岁了，虽死也可以安心了！”蒋介石听了，非常惊奇，问道：“总理今日何出此言？”孙中山回答：“我是有所感触而说的。我所提倡的主义，希望能早日实行。今天看到黄埔军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将来一定能继承我的革命事业，实行我的主义。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如果在两三年以前，我就不能死。现在看到有这样的学生，一定可以完成我未竟之志，所以说可以死而安心了。”当晚离开黄埔抵香港，换乘日本邮船赴上海，受到上海民众万余人的热烈欢迎。

由于上海到北京的陆路交通受军事影响不通，而上海至天津的轮船又极为拥挤，只得取道日本，由日本转赴天津。11

月21日,孙中山乘日本轮船“上海丸”离沪,在日本长崎、神户逗留几天后,于11月30日乘“北岭丸”赴天津。12月4日抵津,受到各界群众两万人的热烈欢迎。

孙中山到天津后,即带着汪精卫、李烈钧、邵元冲、孙科等人驱车赴曹家花园,与当时已在天津的张作霖会晤。张作霖对孙中山心存戒备,事后张告诉汪精卫:“我从前以为孙先生是个什么难说话的人,今日才知道他是一个温厚君子。”

孙中山因旅途劳累,当晚肝、胃病发作,即请德国医生施密特诊治。12月6日中午,肝痛加剧,几乎不能讲话,经德国和日本医生诊视,认为是胆囊炎,服药第二天,肝痛渐止,体温也恢复正常。

当时,段祺瑞应各国公使要求,以尊重不平等条约为承认临时执政府的交换条件,并于内阁会议上通过所谓善后会议条例,与孙中山关于召开国民会议共商大计的要求背道而驰,孙中山非常气愤。12月18日,段祺瑞派许世英、叶恭绰到天津欢迎孙中山入京,在谈到外交问题时,得知段祺瑞对各国公使团有“外崇国信”的保证,孙中山声色俱厉地说:“我在外面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尊重不平等条约,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敬他们,又何必来欢迎我呢?!”一气之下,肝病加重,原定于22日进京,只好延期。

针对段祺瑞召开善后分赃会议的计划,孙中山命令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派出三十多人到全国各地宣传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很快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个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的运动。当时,北京各界人民殷切盼望孙中山早日进京,赴天津欢迎孙中山入京的人络绎不绝,医生也劝孙中山入京疗养。孙中山决定12月31日入京。临行时,

他发表书面宣言，严正表示：“文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利，乃为救国。”

12月31日下午，孙中山由夫人宋庆龄及随行人员陪同，从天津乘火车抵北京，受到北京各界群众十万人的热烈欢迎。这时，北京的局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北京政府处于段祺瑞统治下，冯玉祥已退到南口，他只是派鹿钟麟为代表前来迎接孙中山，直到孙中山去世，冯玉祥始终未能与孙中山见面。

孙中山入京后下榻北京饭店养病，他虽卧病在床，仍无时不在思考救国的方法。这时段祺瑞已决定召开善后会议，邀请名单中99%为军阀、官僚和政客，实质上是举行一次分赃会议。孙中山从大局着想，考虑再三，作出一些让步。1月17日，他口授秘书电告段祺瑞，提出善后会议应加入各界民众团体代表和最后决定权应归诸国民会议的要求。孙中山的这一合理主张遭到段祺瑞的无理拒绝，愤怒之下，孙中山向国民党全体党员下达了抵制善后会议的通知。

经过这番波折，孙中山的病情更加恶化，体温升降失常。1月23日，德国医生克礼发现孙中山眼球中有黄晕，意识到这是肝脏中的脓将侵入身体其它部位的征兆，必须立即施行手术。经与夫人宋庆龄商量，并征得孙中山本人的同意，于1月26日转入协和医院，由协和医科大学外科主任、教授邵乐尔医师主刀，院长刘瑞恒任助手，参加手术的还有一名德国医生和一名俄国医生。手术共进行了25分钟，皮肤切开后，发现肝脏已坚硬如木，生有恶瘤，当即割取其外皮并吸出脓液，经化验分析，确诊为肝癌末期。随后协和医院曾对孙中山施行当时最先进的镭锭照射治疗，依然无效。2月17日晚，刘瑞恒院长致书孔祥熙等，宣告绝望。这时，大家都主张改服中

药,征求孙中山意见。孙中山提出,既在西医院接受西医疗疗,而暗中服用中药,是不以诚待人,坚持要出院方可服用中药。

2月18日,孙中山移居铁狮子胡同行馆,由张静江、胡适之推荐中医陆仲安来诊治,先进黄芪、党参一二剂后,脚肿全消。20日复诊,再开中药煎饮,饮食也几乎恢复正常。但到22日病情又趋恶化。24日随从人员又介绍中医唐尧卿、周树芬等来诊视,谓其“头身发热,脉象洪大,舌乏津液,其色鲜红,决为肝血大亏之证。”

这时,有一位名叫王纶的山东医生,来信说日本医学界新发明一种叫做“卡尔门”的驱癌药水,虽非特效药,也可称为有效药,何不一试?于是立即请王纶来京,经检查他所带的药水,确为日本新发明的药剂,药学家和医家也保证其有效,于是放心注射,最初似乎有效。但克礼医生仍不敢抱乐观态度,指出病人腹水渐渐增长,恐已到最末期。王纶也认为腹水为肝癌最末征候,3月10日早晨,勉强注射了第七次,腹水如故,王纶也只得宣告无效。

11日晨一时,孙中山先生神志忽然清醒过来,召夫人宋庆龄、子孙科以及汪精卫、邵元冲、黄昌谷、于右任、吴敬恒、宋子文、孙祥熙、戴恩赛、邹鲁、张静江等十余人至病榻前。孙中山于稍事休息后,以极为安定的态度低声说道:“我此次放弃两广直上北京,为谋和平统一。所主张统一方法是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建设新国家。兹为病累,不克痊愈,生死本不足念,惟数十年所致力国民革命,所抱定之主义,未能完全实现,不无遗憾。甚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达到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如是

我在九泉之下亦堪瞑目。”经过这番兴奋之后，孙中山脉搏又增高，自知在世不久了，因而令人将2月24日预立的遗嘱开呈，由夫人宋庆龄扶着手腕，用钢笔补签了自己的名字，然后仰卧床上，反复地不断低声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

这一天，孙中山已经不能进食，但神志还很清楚。下午孙中山又发表了对各项事情的最后嘱咐，并当面叮嘱宋庆龄，希望死后能象列宁那样保存遗体，葬于南京紫金山。入夜以后，呼吸更慢，医生以强心剂注射才入睡。到12日晨1时25分，痰忽上涌，不能言语，家人及同志都环立于病榻前，随从人员立即用电话通知了在北京的国民党员，先后云集于行馆。晨9时10分，段祺瑞派许世英来慰问，这时，孙中山已两眼直向上翻，许世英见状慌忙退出。一会儿。周围的人听到孙中山低低地呼唤汪精卫，汪精卫立即赶到病榻前，孙中山张了张口，欲言无声，汪精卫只好请先生安睡。这时，孙中山喉中痰愈加上涌，面色灰白，手足渐冷，9时30分溘然长逝。

孙中山的三份遗嘱

孙中山先生临终前十七天，即1925年2月24日，知道自己病已不治，预立了三份遗嘱，这三份遗嘱是《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前两份遗嘱由孙中山口授，汪精卫笔录，《致苏联遗书》则是由孙中山以英语口授，他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等笔录。孙中山口授遗嘱时，在场的宋子文、孙科、孔祥熙、邵元冲、吴敬恒、戴恩赛、何香凝、邹鲁、戴季陶等人都作为证明人在遗嘱上签了字。孙中山本来也要签字的，但是，因为

听见宋庆龄在邻室悲泣，他不忍心让宋庆龄伤心，这天就没有在遗嘱上签字。直到3月11日凌晨一时，他自知在世不久，才在遗嘱上补签上自己的名字。

孙中山《遗嘱》的全文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在病危之中，仍念念不忘拯救中国、拯救民众。当时的中国处于军阀割据混战的四分五裂状态，段祺瑞坚持召开“善后会议”，实行军阀间的重新分赃，使中国继续处于军阀割据的分裂局面。孙中山则极力谋求和平统一，主张召开有各界民众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决定国家的统一和建设大计，并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摆脱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束缚，从而建设一个新的中国。孙中山在遗嘱中谆谆以此为嘱，把希望寄托于“唤起民众”，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之心。

孙中山先生一生奔走革命，真正做到鞠躬尽瘁，他临终时遗留下的私产，除了衣物书籍外，只有一幢南美华侨赠送给他的上海住宅（即今上海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他的《家事遗嘱》写道：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衣物书籍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

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中山先生晚年得到苏联的帮助，俄国革命的成功给他很大的鼓舞，他亲自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强调“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孙中山临终前夕，再次把希望寄托于苏联，特地口授了《致苏联遗书》。这份遗书的中文译文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也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签字)”

孙中山的亲属和后裔

孙中山先生是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深受全国人民的崇敬和爱戴。他的亲属和后裔的情况，也是许多人所关心的。

孙中山先生 1885 年与卢慕贞结婚，七年后生子孙科，字哲生(1891 - 1973)，于香山县翠亨村。1895 年秋，孙科五岁时，即随祖母，母亲及妹，乘船渡海，远赴檀香山，投奔伯父德彰公。同一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先生离开广州，经过日本，前往檀香山与家人团聚。没过多久，孙中山先生即奔走国事，行踪飘忽。孙科由母亲卢慕贞启蒙教育，学习经史书法。七岁后从师就读，学业精进。不久即考入檀香山中学，苦读四年，成绩优异。民国建立后，孙科公费赴美深造，首先获得加州大学文学士，接着又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理学硕士，专攻政治、经济。回国后，历任政府要职：三任广州市长，曾任交通、青年、铁道等部长，两任立法院长，行政院长，直到国民政府副主席，并先后获得过上海复旦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韩国中央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赴台后，曾任考试院长达七年之久。1973 年 9 月 13 日下午近六时，孙科因心脏病逝世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 83 岁。

孙科夫人陈淑英女士，惯用两个“好”字，来形容自己有两子两女。1913 年，长子孙治平生于美国加州柏克莱，过了两

年，次子孙治强也生于同一地点。他们的名字都是祖父孙中山先生取的，至于名字的含义，孙治平先生是这样说的：他出生时正是民国初年，革旧鼎新、百政待举，孙中山先生殷切地希望国治民安，积极从事建设，期望能达到太平盛世境域，于是为长孙取名为治平，粤语昵称“阿平”。

1915年春，袁世凯帝制的酝酿，已渐趋表面化。“筹安会”竟公开进行复辟帝制活动。陈其美等革命党人奉命策动了肇和舰起义，虽然没有成功，却形成了讨伐袁世凯的先声。孙中山先生有感于治国之道，先求平安，再求强盛，所以给次孙取名“治强”。1922年，陈淑英生长女于广州，也是祖父孙中山先生取的名字，又过三年，次女孙穗华出生于上海，这时孙中山先生已经逝世，是她父亲孙科起的名字。

治平、治强兄弟少年时代，曾随父母和孙中山先生夫妇共同生活。他们称呼宋庆龄为“婆婆”，宋庆龄则用英语称呼孙科为“Mister Foo”，因粤语“科”字发“福”字音，孙科的英文名字为“Sun Foo”，即是取用家乡音的原因。他们相聚在一起，感情不错。孙中山先生一直保持着平民本色，生活非常俭朴。1917年，在广州大元帅府时，曾与部属一起吃稀饭，就咸萝卜干儿，经济困难时，连一个佣人也没有，吃的饭菜则由厨师送上来，家务琐事全部由宋庆龄操持。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特在北京创办海外预备学校，选拔革命元勋优秀子女入学，并亲自授课。讲授的课程包括文、理各科，师资优异、设备完善。治平、治强及蒋经国等都是该校学生，只是不在同一班次而已。治强初到北京，完全不会说国语，觉得很难适应当地的环境，一年以后，自然也就适应了，他们后来都能用国语自如地表达，大半还是受

那段幼年教育的结果。

抗战前，孙治平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他的弟弟孙治强则在南京金陵大学进修。1938年，孙科奉命前往莫斯科，洽商贷款及军援事宜，孙治强陪同赴苏联。后来，因国内战局影响，孙治平、孙治强两兄弟赴美深造苦读数年，学有所成，均曾荣获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经济硕士学位。孙治平与夫人在抗战期间生有一子，祖父孙科命名“国雄”，国雄曾就读于美国怀特学院，婚配檀香山侨民富白莉女士，生有二女，长女名美玲，次女名美兰，现均在美国，是孙中山先生玄孙女，即第五代嫡系后裔。国雄是孙中山先生长曾孙，久居海外，已逾不惑之年。其祖父孙科逝世后，曾随胞叔等家人专程从美国赴台奔丧。事后，家中长辈都劝他就留在台湾，国雄自己也有这样的考虑，并补习国语、国文好几个月，终觉得一时难以适应。又因家庭环境关系，不得不重返美国与妻女共同生活。

孙科夫人陈淑英女士，1893年生于檀香山，是国大代表，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自1965年回到台湾参加国父百年诞辰后，她与家人一直借居于阳明山新园街一号第一宾馆，那原是一座日本式的平房公舍。属于台湾省政府的财产之一，与巍峨雄壮的中山楼为邻。青山绿水，花木扶疏，绿草如茵，清静幽雅，颇能怡情养性。1990年6月30日，陈淑英女士逝世，享年97岁。

其长子孙治平，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台湾电视公司副董事长，并在台北市经商，受聘担任联合发展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余暇之时，最爱读书，涉猎甚广，学识宏丰。

次子孙治强，性情温和，不拘细节，与兄长兴趣不一样。在大陆时曾任中央信托局秘书，并辅佐孙科处理法制工作。